

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谢宏治

(中共衡阳市委 宣传部,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衡阳书院文化肇始于唐代,在宋代、明代和清末民初形成三个发展高峰,分别对湖湘学派的兴起、“王湛之学”和船山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高峰之一。

[关键词] 衡阳书院文化; 发展历程; 特点;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4-0004-06

衡阳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湖湘文化“蓝墨水上游”,孕育了衡阳的厚重辉煌,赋予了这座古城特有的文化底蕴和灵气。书院文化、佛道文化、船山文化和大雁文化,是衡阳四座文化高峰,令人瞩目。其中,衡阳书院文化从唐伊始,一路走来历经千年,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享有极高的地位。曾国藩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本文主要以时间为轴,对衡阳书院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一 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滥觞之水——衡阳书院文化的初始阶段

据现存史料记载,唐代中期,衡阳出现了第一所书院——邺侯书院^[1]。邺侯,即唐代宰相李泌的封号。书院这个名称,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已经出现,但晚唐以前的书院与宋代以后的书院有很大的区别,它一般非官办,而为私设;非讲学之所,而为藏书之地;非面向社会开放,而为家学、族学、士学交流所用。通言之,此时的书院与学堂、私塾之类性质完全不同。

邺侯书院,是唐代宰相李泌隐居读书的地方。李泌是南岳历史上第一位由皇帝钦赐的隐士。他亲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个皇帝,辅佐朝政,屡建功业,又屡屡辞官隐居,在南岳归隐长达12年。他在南岳烟霞峰下建“端居室”,以读书为乐。后来韩愈游历南岳时,写下“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的诗句。端居室就是后来的邺侯书院。今天我们见到

的邺侯书院是1922年重修的。

邺侯李泌的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衡阳书院文化的先河。自他以后,一代代读书人创建的一个个著名书院,为衡阳文化注入了氤氲之气,润泽了蒸湘大地的千年文脉。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唐代,衡阳共出现了5所书院,除了南岳的邺侯书院,还有李宽中秀才书院(即宋代石鼓书院的前身)、韦宙书院、卢藩书院和耒阳的杜陵书院。而当时全国共有书院48所,其中,湖南有8所^[2],衡阳占湖南一半以上。

(二)绚烂之花——衡阳书院文化的繁荣阶段

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僵化,官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促使民间私学走上文化教育的舞台。自宋往后,当时还零散、孤立、小致的书院,迅速发展,形成了与官学并峙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衡阳的书院文化也迎来了三段黄金岁月,形成了三个发展高峰。

1、南宋时期:推动湖湘学派的兴起,成为理学发展的重镇。

两宋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型时期,传统的儒学不断转化,理学发展迅速,学派林立,巨儒大师辈出,他们需要通过自由讲学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而书院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衡阳书院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出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这一时期衡阳书院的代表是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文定书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肇始了湖湘文化。文定书院的旧址,现为岳云中学“春秋楼”

(即科技楼)所在地。这里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

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儒学发展到了宋代,终于迎来了一场真正的复兴——理学的诞生。湖湘学派就学术本质而言,正是宋明理学的一大学派。理学在北宋发轫之初,有周敦颐的“濂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到了南宋,则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金华之学”和胡氏父子的“湖湘学”,其中又以“闽学”与“湖湘学”最为出名。两支均是北宋二程之“洛学”南传的结果^[3]。

南宋初年,胡安国(1074—1138)来南岳衡山定居,在紫云峰下文定书院讲授《春秋》之学,湖湘学派由此而发端。胡安国早年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研究性命之学。入太学时,又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得程学真传。胡安国对于心、理、性等理学范畴的研究虽尚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却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哲宗年间,胡安国属保守派,他在被罢后定居南岳,专心授学。他在文定书院讲学撰著,深论《春秋》,感于时事,经世济民。受其影响者,除了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还有众多湖湘士子。胡安国去世后,其子胡宏(1106—1162)承继了“春秋大义”家法,以文定书院为基地,以南岳衡山为中心,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弟子,如张栻、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从而促进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文定书院作为培养和造就湖湘学派人才的基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直接影响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和湖南近千年的历史。

宋代衡阳的另一所更具代表性、影响更大的书院是石鼓书院。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宋代全国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创立于唐元和年间,衡阳秀才李宽在蒸水、湘水交汇的合江亭旁建“寻真观”,在此悉心读书,为书院之雏型。宋至道年间,李宽族人李士真在这里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书院具备了教学与传播思想的功能。

石鼓书院因先后两次获宋太宗、宋仁宗赐匾而独享尊荣,而诸多理学大师把这里作为学术交流与思想传播的平台则是其走向鼎盛的重要原因。

到了宋代,官学的弊端逐步显露,各级官学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把儒学倡导的“道”抛到脑后。理学家们认为,这是读书人的耻辱,于是,他们纷纷通过创办或利用书院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都是他

的学生。周敦颐幼时曾在衡阳舅父郑向家读书,后又在衡阳兴建廉溪书院,讲学授徒。史志中有关周敦颐与石鼓书院的记述不多,但明代李安仁有这样的见解:“濂溪周公敦颐,古今称为绝学,其有声于石鼓,当不下唐宋诸儒。”^[4]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在石鼓书院授过业的。

一百多年后,理学大师朱熹与张栻将石鼓书院的声望推向了顶峰。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是孔孟之后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也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传经白鹿、讲学岳麓、论道石鼓,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三大书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张栻在南岳文定书院跟随胡宏学习,后来成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他与朱熹、吕祖谦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公元1167年,闽学与湖湘学两大理学流派的代表——朱熹与张栻,嘉会于岳麓、石鼓,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由讲学、自由辩论的先河,为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学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提倡自由辩论、思想碰撞的书院文化日益兴盛。

见证朱熹、张栻与石鼓书院关联的是一块著名的三绝碑。所谓三绝,是指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亲书《石鼓书院记》和韩愈《合江亭》诗文。后人依此镌刻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

朱熹曾与张栻畅游衡山七日,共同研讨理学话题三昼夜。朱熹还论道石鼓,专门写了一篇《石鼓书院记》,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为天下学子打开“入德之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之后的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宋代衡阳的著名书院,除了前面所说的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外,还有张栻创办的南轩书院,位于南岳大庙西边的赵季西书院和衡山的清献书院、常宁的芹东书院(清代改名为双蹲书院)等。

2、明代时期:推动“王湛之学”的交流,成为心学传播的平台。

元朝一代,书院基本处于政府监控之下,石鼓书院与全国书院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元时有记载的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佐、程敬直、王复、康庄、张珪,元时著名官宦学者伯颜、契玉立、李处巽、陈松年都题写过石鼓山水、书院诗文胜景,说明石鼓书院在当时也是享有盛名的。但南宋的自由讲学之风,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元代,衡阳的书院文化处于低潮,也没有创办新的著名的书院。

到了明代,衡阳的书院文化又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石鼓书院再一次成为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中心。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湛若水。湛若水,字甘泉,属明儒理学的白沙学派,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他与主张“致良知”学说的王阳明虽各立门户,但却是至交好友。

儒学在宋时为理学,明代初叶,“心学”的崛起可以视为儒学的又一次革命。明代“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阳明、陈献章与湛若水。宋初理学的鲜活生命发展到明初已成为死水一潭。学术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陈献章却敢于挑战权威,以开放的学风冲破这种思想僵化的局面。湛若水是陈献章的高足,王阳明没有见过陈献章,却通过湛若水对陈献章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明朝嘉靖初年,王阳明曾游南岳并在文定书院讲学。湛若水本来相约同游,却直到 20 多年后才来到南岳,此时他已 78 岁。此后,湛又两次游历南岳。

陈献章,广东新会人,人称白沙先生,是明代大儒。他对南岳衡山魂牵梦萦,虽然没有到过南岳,却留下了许多写南岳的诗歌,如《梦游衡山》、《忆衡山》等等。陈献章游历南岳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为此,湛若水特地在南岳紫云峰下修建白沙书院,以纪念恩师。此外,他还在南岳建甘泉精舍(后改为甘泉书院),讲学其间。湛若水对衡阳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他视南岳和石鼓书院为传播理学的圣地。他先后五次到石鼓书院讲学,高扬心学旗帜,湖湘学子慕名而至,极大地推动了心学对理学的变革^[5]。

石鼓书院作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不但湛若水对它青睐有加,而且王阳明的弟子也对它非常重视。嘉靖十年,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慕名而来,讲学石鼓书院,阐述“致良知”的思想,从学者蜂拥而至。邹守益,号东廓,江西安福人。他认为,教育是人后天赖以长进的最根本的途径。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并对“致良知”作了充分的发挥。他也在南岳办了东廓书院。

学者用“王湛之学”统称阳明学派(王学)和甘泉学派(湛学)。“王湛之学”作为明代中叶的盛学,两派虽各立宗旨,但他们的门人弟子并没有多少门户之见,王学门人可以卒业于湛学,湛学弟子可以受业于王学,王、湛二学成为了秦晋之好,这在学派林立的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当时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甘泉、白沙、东廓等书院,作为“王湛之学”最重要的传播平台之一,众多一流的学术大师交相辉映,一时名重天下,形成了南宋之后的又一个鼎盛高峰。

3、清末民初:推动船山实学的传播,成为近代人文的源流。

清代衡阳的书院,经历了肃杀和繁荣两个阶段。在雍正之前,衡阳的书院比较萧条。在雍正以后的 100 多年间,衡州府先后恢复和兴办书院 50 多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船山书院。船山书院是晚清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一所书院。书院从创办伊始,就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办学宗旨,重在以船山精神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明末清初,衡阳诞生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王船山。由于王船山是主张反清复明的,在 200 多年间,他的思想并不为世人所知,更不为统治阶级重视,直到清同治年间,湘军统帅曾国藩力倡船山学,刻印《船山遗书》,使“闾寂二百年的船山学倡行天下,成为风行中国一大显学。”

曾国藩倡船山学,和他在衡阳的一段求学经历不无关系。清代中叶以后,衡阳书院的兴盛,不仅吸引了大批本地子弟就读,对外地学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慕名来到衡阳,先后在欧阳凝祉处和金溪双桂书院求学。衡阳硕儒汪觉庵当时在双桂书院执教,他对船山学深有研究,并以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教授弟子,曾国藩兄弟受益匪浅。后来,曾国藩通过了县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被赐予同进士出身,进入了翰林院。就在入翰林院的当年,他还告假回衡阳,为老师祝寿。后来虽然南征北战,但他每天必读船山之书。

在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船山学成为晚清的显学。推崇船山之学,衡阳人自然是责无旁贷。光绪十年(1884),衡阳士绅集资在城南创建船山书院,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320 卷版片捐给书院。第二年,衡阳籍兵部尚书彭玉麟独捐白银 12000 两,买地改建于湘江中的东洲岛。书院建成后,彭玉麟亲笔题写“船山书院”四个大字,还撰写楹联,上联是:“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下联是:“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从此,船山书院名声大震。直至 1915 年,迫于新学的压力,船山书院改为船山存古学堂,标志着船山书院命运的终结。

在衡阳知名的书院中,船山书院虽然存续的时间最短,但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和重大的影响。一是办学规格高。从办学发起人来看,清光绪八年,湖南提学使朱道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衡州乡绅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和曾国荃积极募捐。其中,彭玉麟曾担任过清水师统帅、兵部尚书,

曾国荃曾任两江总督等要职。船山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四府州士绅捐集,每年田租2500余石;衡州团防捐余款购置田地,每年田租1500余石;每年省里拨给的补助费和书院自收款项。船山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达5000石。从县学到道学,船山书院学资均为当时书院之最。船山书院教师名气大,所聘的掌教多为大儒学者,先后延聘的有邓辅纶、王闾运等。邓辅纶,湖南新化人,近代诗文家。王闾运,人称湘绮先生,湖南湘潭人,为晚清一代硕学鸿儒。他一生在经、史、文学、教育等方面都成就斐然,其思想得力于公羊学说,经弟子发扬光大,对晚清思想界影响很大,时有“南王(闾运)北俞(樾)”之说。在招生上,船山书院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既有门槛又无限制,既有取向又讲际缘。有门槛,则是建立了一套选拔性吸收人才机制。船山书院每年2月初旬定期招收生徒,通过衡、永、郴、桂四府所属县考试,择优选送,再由衡州道应试录取,方可入院就读;书院规定王船山先生后裔,每届可保举1人入院读书,免收费用;对遵守学规,成绩优异的生徒,给发膏奖(即奖学金)。船山书院招生考试虽然规模不大,但生源选拔严格,每年每次招生不足100人,有时不足50人^[6]。无限制,主要是在地域、出身、政治及学派等方面,不设过多限制,具有开放办学、海纳百川的胸襟。书院招收的学生立足衡阳,但放眼湖南,省域之外也有人慕名而来。学生出身,更是五教九流,只要经过考试或名士推荐,都可入院。正因为如此,船山书院一经创立,便像一个磁场,成为众多学子向往的文化学术殿堂,“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有取向,主要是指在王闾运任书院山长之后,有意识地吸纳了一些“不课八股,但慕实学”之才,培养了一批不重科举,但在政治、军事、地理、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奇才,包括杨度、杨锐、“王门四匠”等人。讲际缘,主要是指在招生及商聘师长时有着一定的机缘巧合。创办初期,彭玉麟、张宪和等人的意见建议基本被采纳,到王闾运任山长之后,又被深深打上“王氏烙印”,再往后,随时局发展,船山书院渐渐与学堂无异,还一度改为“农业学校”、“东洲讲坛”,再往后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办学校。甚至在王闾运任山长时期,前后取向也并不完全一致,初期主张帝王之学,大招能辩善术之才,后期心灰意冷,重国学儒家之士。四是历史影响深。船山书院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推动者。在戊戌变法中,船山书院至少有20名学生参与其中,学校还开展过激烈的时事辩论和讲

演。船山书院教学内容以船山学为重点,“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培育出了一大批改革家、政治家,他们成为了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船山书院培养的学生杨度,一生极为复杂,与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周恩来等风云人物关系密切,在公车上书、君主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走向共和等重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蒋啸青等后来成为共产党中的骨干力量。“王门四匠”中的齐白石、八指头陀等人,深深影响了中国艺术界、佛教界。可以说,船山书院是湘中南一带最具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力的重地。船山书院时期是传播船山实学思想的最高峰。正是船山书院的开办,让船山学成为一大显学,使船山学说影响中国甚至走向世界,船山先生也与黑格尔一起被并称为“人类思想夜空的双子星座”。

(三)薪传之火——衡阳书院文化的传承阶段

民国中后期,衡阳的书院纷纷迁建,有的改为学堂,有的改为现代学校,有的废弃于野,成为历史深处的记忆。但衡阳书院文化的传统并没有中断,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传承、弘扬和光大。

民国时期,随着新学的兴起,衡阳随之成为湖湘革命摇篮和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特别是抗战时期,衡阳还一度成为全国第二或第三大城市,许多大学、中学迁移至此。如湖南师大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创办于1938年,是我国第一所独立举办的师范学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学院曾在衡山复校。

新中国成立后,衡阳依然是湖南的教育大市、文化大市。衡阳的高等院校数量、在校学生、科研水平等均位居全省前列。现在南华大学、衡阳师院、湖南工学院、衡阳市一中、岳云中学等学校,与衡阳历史上的书院都有着一脉相承、同源同根的关系。

今天的衡阳,一直致力于传承千年的书院文化。2006年,举全市之力重修了石鼓书院,让千年石鼓重新迸发人文之光。对船山书院、文定书院、邨侯书院等也正在抓紧保护、修缮之中。更重要的是,突出教育先行和文化强市,大力实施“文化塑城”,衡阳的文化源流一直滚滚向前、延绵后世。

二 衡阳书院文化的特点

衡阳是一片积淀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大地,从神农创未开启农耕文明,到蔡伦造纸推动人类文明;从神奇传说中的帝誉兴兵,到不为人知的嫫祖织纱;从受人景仰的祝融取火,到千古之谜的禹王圣碑;从佛教南禅的承传光大,到湖湘学派的发源兴盛,衡阳涌现出一串串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其中书院文化又

是衡阳众多文化形态中的翘首。“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这是一句让衡阳人不能不文化自信的话。追溯岁月而上,无论是创立时间,还是数量质量,无论文化传播,还是思想交流,无论学术成就,还是人才培养,衡阳都是中国书院文化中最闪亮、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

衡阳之所以被称为文明奥区,与书院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综观衡阳千年的书院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起源早

唐代中期,邺侯书院创立于南岳,它是唐代史料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之一。但当时的邺侯书院因为对外开放讲学较少,影响有限,有的文献没有收录进唐代书院之中。唐时书院从《全唐诗》中考证有 11 所,而在地方史志中有记载的为 17 所(以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和王镜第著《书院通证》及周书龄著《书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 17 所为准)。两者都有记载的仅三所:衡阳李宽中秀才书院(即石鼓书院)、南溪的南溪书院、永济的费君书院。

石鼓书院史载建于公元 806—820 年间,是中国四大书院中创建时间最早、并具有确切史志记载的书院。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石鼓书院的创建时间比宋代其它三大书院都要早。其中,比创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的白鹿洞书院早 120 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早 160 多年;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的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早 199 年。再拿曾一度被纳入“五大书院”之一的嵩山书院(又称嵩阳书院)对比,据《开封县志》记载,其创建时间为五代周时,比石鼓书院也晚了近两百年时间。石鼓书院还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一个在唐朝时就已相当著名的书院。唐时,齐映、宇文炫、吕温、韩愈、邹君等名家都在石鼓书院留下过诗词。

当时,为什么会在衡阳出现并兴盛书院这一新的文化和教育载体?唐代中后期,科举极为盛行,江浙、长安、洛阳等地经济繁荣,大兴官学,岭南漠北又较为莽荒,而湖南、江西一带正处于这种文化和教育的过渡地带,为私学的代表——书院的创立提供了良好条件。衡阳在唐时已是湖湘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衡阳人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衡阳包括南岳一带山水秀美、民风纯朴、交通便利,被贬、被撤和隐居隐逸的文人士官非常多,这些是促成衡阳成为全国书院文化最早发端的地方之一的重要因素。比如邺侯书院,就是辞官隐居的唐代宰相李泌在自然风光秀美、充满文化灵气的南岳创办的家庭式书院。

(二)数量多

地方史志中记载的唐代书院共 17 所,其中衡阳就有 5 所,分别是南岳的邺侯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宋代石鼓书院的前身)、韦宙书院、卢藩书院和耒阳杜陵书院。宋时衡阳书院又为全国之最,有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还有南轩、文定、双蹲等当时著名的书院。明嘉靖时,全国有书院 900 多所,其中湖南 124 所,衡阳就有 31 所。清光绪年间,仅南岳就有邺侯、卢藩、文定、甘泉、白沙、东廓、集贤、景行等 27 所书院,当时湖南每个县只有 4 所书院。这些书院如满天星辰,灿烂了衡阳的历史文化天空。

(三)影响大

其一,衡阳书院文化是中国书院文化的典型代表。言书院文化,必称湖南衡阳。无论是产生时间,还是数量质量,无论文化传播,还是思想交流,无论学术成就,还是人才培养,衡阳都是中国书院文化中最闪亮、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两派会讲于岳麓、石鼓,开自由讲学的先河,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学术的繁荣,奠定了湖南衡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衡阳书院文化之深厚,地位之崇高,学术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为盛天下。

其二,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瞩目高峰。从横向来看,书院文化在衡阳光彩夺目。衡阳历史文化极其深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大雁文化、农耕文化、寿文化、火文化、佛道文化、抗战文化、山水文化等,每一种文化,都非常厚重。书院文化,仍然是其中最夺目的文化景观之一。至今,石鼓书院、船山书院等仍是来衡客人的必去之地。从纵向来看,书院文化也是衡阳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衡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历史上的几次走出湖南、走向全国,都与书院文化紧密相关。宋时,衡阳是理学研究重地;明时,又是心学研究中心;明清之际,又成为王船山“实学”的传承基地。尤其是船山学说的推广、运用,与书院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在彭玉麟、郭嵩焘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倡导与推动下,清朝末年建立的船山书院,其建立初衷就是为了弘扬船山学说。从创办伊始,船山书院就大力传播船山实学,培养了一大批学子,如杨度、杨锐、“王门四匠”(僧人释敬安、铁匠张正炆、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蒋啸青等。书院是近现代人文的重要源流,由于船山书院对实学的倡导,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书院开办实学,发展实学,助推并形成了实学传播的时代热潮。正是船山书院的开办,让船山学成为一大显学,使船山学说影响中

国甚至走向世界,船山先生也与黑格尔一起被并称为“人类思想夜空的双子星座”。中国自宋代以来儒学的三大阶段性创新,衡阳都有参与,而且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衡阳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由此确立。

其三,书院文化是衡阳地位变迁的重要因素。尽管衡阳历史悠久,三皇五帝大都来过衡阳,或与衡阳有过密切关联;自三国时期起,衡阳就开始设郡设县,成为湘南中心;衡阳人才辈出,蔡伦、蒋琬等人早已名播天下。但是,衡阳真正在中国以文化的影响而著称天下,还是因为书院文化的兴盛。湖湘学派发轫于南岳,轰鸣在三湘四水;王湛之学以石鼓书院为重镇,瞩目于天下。可以说,正是书院文化,让偏隅湘南的衡阳为四方所瞩目,开始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出更强劲、更响亮、更精彩的声音。自书院文化兴盛以来,衡阳乃至湖南,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的。文化大师钱钟书先生曾漫谈说: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言文化和人才,主要集中在自长沙至衡阳、沿回雁峰至岳麓山这一八百里南岳衡山山脉一带。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阳书院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兴盛、湖湘人才的成长、湖湘经济的发展,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三 衡阳书院文化的启示

书院是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追思衡阳灿烂的书院文化,有几点值得感悟的启示。

(一)文化是一张名片,必须擦亮彰显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即使是普通的山水,一旦与名人结缘也会立刻身价百倍,成为众人所景仰、所神往的名胜,更何况一座全景生态、丰富资源、数万人居留的城市?一座城市,最有内涵和价值的是文化,最具标识性和代表性的也是文化。书院文化毫无疑问是衡阳最具亮点和特色的文化名片之一,但这张名片,如果不擦亮、不发掘,依然会沉于古籍古典之中,而不为人知、不为人所用。因此,弘扬发展衡阳的传统文化,首先应从衡阳的书院文化入手。要整理其文化史脉。要借石鼓书院、船山书院这些载体,把衡阳深厚的书院文化,以及大雁文化、农耕文化、佛道文化、湖湘文化等进行全面梳理和整复。要传承其文化精神。通过举

办书院文化论坛、专家座谈、市民学校等,引导和带动更多的人把目光停留在这里,把思想承连在这里;通过组织开展好石鼓书院大讲坛、书院寻道等活动,传承衡阳书院的文化因子;将书院文化与衡阳的“名人文化”相结合,开展一些特色活动,打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品牌。这些年来,衡阳的文化人不断搜集资料、建整旧址、扩大宣传,就是为了把这张名片更好地打出去,让它彰显品位、增强影响、扮亮城市。

(二)文化是一片土壤,必须深垦细培

从书院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环境与文化是互促互进、互为依存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业态;有什么样的文化气象,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衡阳的千年书院,是衡阳历史文化长河中最重的一笔,它既是传统文化变革的重地,又是开放性的学术研究中心,还是教育革新的基地。衡阳之所以能站在书院文化的潮头,也是因为衡阳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营造了包容、开放、奋发的社会氛围,涌现了一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甘于奉献的仁人志士。文化的土壤,需要深垦细培,让最优秀的思想文化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

(三)文化是一种责任,必须传承弘扬

文脉不绝,自有兴。文化也是一种责任,立于当代,需要以文化来启蒙思想、振奋精神、丰富生活、提升品位;处于后世,需要把文化搜集梳理、发掘保护、传递继承、发扬光大。作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主人,衡阳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使命更大。衡阳有着如此深厚、灿烂的文化,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责任。每一位衡阳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为打造衡阳文化之城、推动衡阳崛起而奋斗。

[参考文献]

- [1] 李元度.南岳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3.
- [2]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 [3] 陈忻.宋代洛学与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4] 李安仁,王大韶,李扬华.湖湘文库——石鼓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9.
- [5] 邓洪波.王湛之学与明代书院的辉煌[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57-63.
- [6] 刘平,章启辉.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27-132.